

教育生涯漫談 (四)

劉季洪

• 66 •

參、北伐前後的教育工作

民國十四年暑期我在北京高師畢業以後，首先要考慮服務問題。當時原籍徐州設有省立中等學校兩所，校長及教師多由外籍人士擔任。適巧這時的母校省立七師校長辭職，在省垣南京幾位徐籍省議員就主張應由本籍人士接任。但是徐州具有此項資格的人不多，最後想到嶗山縣的李蔭棠君，他是比我早兩期在北京高師畢業，留在北平孔德學校任教。於是由我連絡約他同意，很快由省教育廳發表。

先回母校任教

省立七師是我的母校，離開僅有四年，所以校內情形大致瞭解。這時師範已改學制，分前後期各為三年。行政方面，校長之下有教務、訓育、總務三個主任。接收後，教務主任由北京高師教育研究所畢業同學四川籍的柴斯可君擔任，訓育主任及總務主任則由我和朝陽大學畢業的蕭縣同鄉王雪琴君分擔。因為校內學生僅有六班共二百餘人，行政組織極為簡單，三位主任均無助理人員。

開學不久，教務主任柴君因父病返四川原籍，當時交通不便，柴君去後一再請假竟未返校，教務工作由我代理直至次年暑假。同時我還擔任每週十七小時的理化課程，實驗室僅有工友一名，所有學生物理化學實驗準備工作，亦須由我自理。所以這一年不僅教務及訓育行政集於一身，教課也是很忙，每天都要早六時起床，晚十二時就寢。當時雖然年輕，勉可支

持，但健康很受影響。

在這一年中，國內政局動盪極大，北方張作霖馮玉祥合力擊敗直系以後，奉張積極向關內發展，以李景林、張宗昌、楊宇霆、姜登選分任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督辦。直系浙江督理孫傳芳懼將圖己，聯絡皖贛兩省舊蘇軍反攻蘇皖，楊姜倉皇北退，孫氏聯絡蘇皖贛浙閩五省，相約互保，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在此一年中江蘇省政兩次易主，但對省立學校影響不大。

在南方自十四年二月先總統蔣公率黃埔軍校學生掃蕩粵東叛逆，肅清廣東全境，十五年三月廣西李黃通電歸隨國民政府，於是蔣公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師北伐。全國人民亦在北洋軍閥多年紛爭水深火熱之中，燃起新希望，引領以待王師。

與張鳳齋女士結婚

我在徐州任教一年，目睹國內大局，勢將發生巨變，而在本地親友衆多，人事煩擾日在增加，故決意早日離去。十五年暑期徐州蕭縣同鄉魏紹舜、朱凌斗二君在東南大學教育系畢業，遂向學校建議約其來校任教，並將我所兼任教務及訓育職務分請二君分擔，以便本人隨時可以遠離。同時在當年七月間與去歲訂婚的張鳳齋女士在徐州市舉行婚禮。學校職務既已減輕，又得家室溫暖，生活大為改善。

我因已有改換環境計劃，曾與外地同學聯繫，首先接獲天津南開中學聘約，但安頓家庭一時難以就緒，遂允寒假應聘。繼而北平孔德學校亦來

邀約，於是在十五年冬學校將結束時，特先到天津南開與教務主任面商，如該校能即聘他人，我則請其諒解將聘書退回。張主任陪我先在校內參觀，並在飯廳與同事共進午餐，表示可以接受我的請求，並希望以後能再應邀。

北平孔德學校是用中法庚款創辦的，包括中學、小學和幼稚園各部門，學生多數是北京大學教授的子孫。校長名義上是蔡元培先生，但蔡先生並未到校，由李石曾先生代理，而李先生也不到校，校務實際上是由沈尹默先生負責。我是在中學部任教，校址在東華門外北河沿。校內行政有教務及總務兩部門，我兼任教務，總務由馬廉先生擔任。教員多為兼任。學生全為走讀，教職員亦不住校，所以每天下午四時後校內已寂無人影。我到校因在寒假，僅分配任課一門，每週二小時，教務工作亦極簡單。又因我單身來校，學校特安排住在校內，三餐則往附近東安商場各餐館進食。

民國十五年先總統 蔣公於七月一日以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頒布北伐令，各路軍事節節勝利，十一月已克復湘、鄂、贛、閩各省。北方軍閥大為恐慌，張作霖於十二月一日在天津自任安國軍總司令，並任孫傳芳、張宗昌為副司令。北平方面對革命黨人嚴加防範，對於青年尤加注意。在平服務的高師同學常相集議，咸認留平既有危險，而南方革命軍政正在迅速發展，亦有前往參加必要。於是有國民黨籍的同學十五人決定結伴南下。我向學校說明，得其諒解，於三月上旬和同伴前往天津，乘泰安輪經海道赴滬。當時因限於經濟，合購統艙團體票，艙位在船尾底層，乘客擁擠，空氣污濁，船未開行，已先暈吐，船行三日，未進飲食，抵滬登岸，猶覺天旋地轉，真是苦不堪言。到滬所住客棧又適巧是泰安棧，休息兩日後，同人分別先至各處探詢時局大勢以定行止。

國民革命軍自上年七月開始北伐，數月之中已摧毀吳佩孚、孫傳芳主力。此時共黨份子俄顧問鮑羅廷指揮之下，自十六年一月起進行奪權，至二月間在武漢藉中央黨部名義公開攻擊 蔣公，分裂形勢已甚顯著，同來同志幾度研商，多數主張先到武漢觀察實際情形，我則認為中央黨部在武漢已為共黨把持，不宜自投羅網。結果除我一人外，其餘十餘人均仍搭江輪前往武漢。我在滬停留不久，國民革命軍於三月二十一日克復上海，

又於二十三日克復南京，我於三月底也同居滬同志數人前往南京參加黨務工作。

出任江蘇省教育廳督學

四月一日武漢方面受共黨份子把持，竟下令免蔣總司令職務，黨中元老認為事態嚴重，四月二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會，通過吳敬恒請查辦共黨份子謀叛案，於是國民黨進行全面清黨。十七日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開會，決議國民政府於當月十八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此時吳稚暉先生常在南京，住鐵湯池招待所。我因在北平時常有向吳先生請教機會，故又時蒙接見多有指示。四月底江蘇省政府成立前，吳先生告以蘇省教育廳長將由張乃燕先生擔任，正在物色廳內人員，詢及願否參加，當即回報個人接受師範教育，志趣即在教育工作。經吳先生介紹，張廳長立即發表為省督學。南京原為江蘇省會，此時省府尚未他遷，教育廳暫假馬府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於五月三日開始辦公。

張乃燕廳長為黨元老張靜江先生之姪，留學比利時，研究化學，獲有博士學位，但其興趣又在歷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居留歐洲，就其所見，著有世界大戰全史一巨冊，後又著有羅馬史。此時回國擔任教育行政工作，對教育界情形本極生疏，但組織教育廳所引用的都是教育界的人員，頗為難得。廳內分為五科：第一科掌總務，第二科掌高等教育，第三科掌中等教育，第四科掌初等教育，第五科掌社會教育。科長分由鄭宗海（東南大學教授）、孟憲承（大夏大學教授）、沈履（清華大學教授）、程時燿（北平師大教授）、俞慶棠（大夏大學教授）擔任。督學則有汪懋祖（北平師範大學教授）、陳鶴琴（東南大學教授）、周宣德（現在台灣為佛學領導人）及本人等。

在黨務方面，因在全面清黨，需人孔亟，此時我亦被派為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及江蘇清黨委員會與南京市清黨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數種工作，因而每日極為忙碌。

大學區制的試行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進而統一全國，在政治各方面力求革新，對於教育行政制度也有重大的改革。當時我正從事教育工作，親臨其境，所以順便要把教育上幾項重要改革的實況和所產生的影響略作敘述。

我國近代教育行政制度自民國元年起中央設教育部，自六年起各省設教育廳。國民政府在廣東時因統轄地區不大，於十五年僅設教育行政委員會。及至十六年定都南京，是年六月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組織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任命蔡元培為院長。大學院的組織自十六年六月至十七年四月不滿一年中先後四次修正，最後公佈的組織法規定：「中華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直隸於國民政府，依法管理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內設秘書、總務、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會教育、文化事業等六處，分別執行教育行政事務；設大學委員會，審議學術教育一切重要事項；設專門委員會，研究並辦理特殊事項。

新制大學院與舊制教育部性質顯有不同：第一、大學院除掌管全國教育行政外，並同時直接掌管全國學術審議事項；第二、名稱與中央其他各部不同，而稱為中華民國大學院，直隸於國民政府，具有超然獨立的性質。

大學院成立後，對省教育行政亦有重大改革，廢除教育廳而試行大學區制。其構想認為我國過去教育行政機關與學術研究分離，難求進步，「自宜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行政制度之單元，區內之教育行政事項，由大學校長處理之，遇有難題，得由各學院相助以解決之，庶幾教育設施有學術之根據。」當時還特別提出兩個口號，說要「行政學術化」、「機關學校化。」此一新制先在江蘇、浙江兩省試行。江蘇教育廳於十六年六月裁撤，以過去的東南大學為主體，合併各省立專科學校，改稱第四中山大學，仍以張乃燕為校長。在大學之下設教育行政院，管理江蘇全省各級教育，所以江蘇在教育方面為第四中山大學區。不久又以省區命名，改稱江蘇大學區，後以大學學生反對，再改稱中央大學區。浙江則於十六年八月改為第三中山大學區，後又改為浙江大學區。

大學院與大學區制度的創立，完全由於蔡元培先生的理想。此種理想的主源，一方面似因鑑於過去北洋政府時，教育深受政治干擾，難以安定發展，故擬將教育置於一般政治範圍之外；另一方面似因蔡先生留學歐洲

，目睹法國實行大學區制，而欲移植於我國。但理想與實際並不相合。首先教育為國家施政的一環，無法脫離政治，政府不良固能影響教育，而政府開明亦能助長教育發展。其次我國國情與法國大不相同，不但省區幅員大小懸殊，且法國全國十七個大學區均設有大學，而我國當時設有大學的省份甚少，自無法推廣此一制度。制度本身既有問題，因而試行不久，形成行政混亂，效率不彰的現象。加以蔡先生重用楊某，其人小有文才，但缺少恢宏氣度，對教育界未能廣納人才，且喜排除異己，在政府鼎新之初，不僅未能延攬教育人士群起投入革命陣容，更多措施失當造成不少糾紛。彼離職後終以行多不端，竟被人殺害身死。

大學院及大學區制度試行後，因問題叢生，引起各方反對，十七年冬國民政府改組，在中央取消大學院重設教育部，蘇浙兩省大學區亦於十八年撤消改設教育廳。但此一波折，對於革命政府所生不利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江蘇教育的改制

我自十六年五月初擔任江蘇省教育廳督學，第一項工作為奉派接收設在南京的省立法政專門學校及省立第一中學等教育機關。當時因受戰事影響，學校均早停頓，校長因政局改變，皆早自動離去，教員也都各自星散，校內僅留工友數人看守，所以接收工作極為簡單，僅將校產查看一周，加以封存，並囑工友繼續看守，仍予留用而已。

江蘇教育廳成立後除派人接收各省教育機關外，廳內首先討論今後學制問題：一是專門學校的存廢，一是各類中等學校是否合併設置。關於專門學校的存廢須候中央政府的決策，所以教育廳更先着重本省中等學校制度的研討。

我國學制自清末以至民國初年，大學與各類專科學校以及普通中學與師範、職業學校均係分別獨立設置。江蘇教育素稱發達，各類各級學校辦理亦多完善。但自民國十一年新學制公布後，內容多係仿自美國，中等教育部分有「高級中學分普通、農、工、師範、家事等科」的規定，顯為趨於綜合中學制度。此種新制自民國十二年起浙江、廣東首先試行，十四年

湖北繼之，江蘇在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前並未實行。此時國府新成立的江蘇教育廳認為在教育制度上應澈底改革，一新耳目，計畫將全省大專學校合併為一大學，並將省內各地同一地區的中學、師範與職業等校合併而為一省立中學。因此，原有的省立法政專門學校及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等，均併入東南大學；而省內各地的各類中等學校分別合併為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上海、松江、太倉、南通、揚州、淮陰、鹽城、東海、徐州十四個中學，另設南京、蘇州、松江、淮安、徐州五個女子中學，招收男生的中學亦多附設女子部。此一新計劃在廳務會議討論時，意見並不一

致，但由於中等教育科長沈履極力主張，終獲通過。中等學校究應分別設立或綜合設立，教育人士常有討論，利弊得失難有定說。但以江蘇此次改制而言，顯係弊多利少。因蘇省各類學校原已各具規模，合併後仍需利用原有各校址分為校本部與分部，行政管理反為不便，且對師範與職業等部份的專業精神更難充分發揮。因此，江蘇教育此次改制雖一時鬧動，各省起而倣效，但不久引起普遍不滿，至十八年後各省又先後恢復原有各類中等學校分別設立辦法。這項改革也和試行大學區制一樣，不但未能產生預期效果，反而使人有顧慮不周，草率從事的感覺。

(人人文庫二五五七—五八)

中國美術東漸散論

李欽賢著
定價二七元

本書為作者研讀中韓日美術史屬於古代部分而輯錄成冊者，旨在引證中韓日美術交流的史實，藉以充實中國美術史領域，擴大至對外影響的新內容。

人人文庫特七三五、特七三六

論墨人及其作品

(上下册)

程石泉
宋瑞等著
定價九〇元

這是有關作家墨人先生四十多年的創作經驗、文學思想、文學生活的一本最完整的作家個人研究、作品分析的專書，也涵蓋了近代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真實面貌。為想讀好書的讀者提供了一個創舉。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